LUND UNIVERSITY

__“”

Schoenhals, Michael

Published in:
国史研究参阅资料

2007

Link to publication

Citation for published version (APA):
Schoenhals, M. (2007). 国外当代中国史研究的现状与特点—浅论今日欧洲“文革学”的几本新作. *国史研究参阅资料*, *356*, 49-64.

Total number of authors:
1

General rights
Unless other specific re-use rights are stated the following general rights apply:
Copyright and moral rights for the publications made accessible in the public portal are retained by the authors and/or other copyright owners and it is a condition of accessing publications that users recognise and abide by the legal requirements associated with these rights.
• Users may download and print one copy of any publication from the public portal for the purpose of private study or research.
• You may not further distribute the material or use it for any profit-making activity or commercial gain
• You may freely distribute the URL identifying the publication in the public portal

Read more about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s: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

Take down policy
If you believe that this document breaches copyright please contact us providing details, and we will remove access to the work immediately and investigate your claim.

LUND UNIVERSITY

PO Box 117
221 00 Lund
+46 46-222 00 00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国史研究参阅资料

2007年10月　10　总第356期

●多谋善断　功勋卓著
——《陈云传》写作的体会　曹应旺（1）

●反右派斗争研究述评　魏继昆　谈家水（29）

●国外当代中国史研究的现状与特点
——浅论今日欧洲“文革学”的几本新作
〔瑞典〕沈迈克（49）

当代中国研究所主办　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社编

国外当代中国史研究的现状与特点*

——浅论今日欧洲“文革学”的几本新作

◎〔瑞典〕沈迈克

2006年，“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40周年纪念悄然来临。只有少数会议和学术研讨关注这个话题。说起这场运动的历史意义，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际上，人们本应怀有更多期待，实际上却少得可怜。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作为“一切群众运动之父”已经不再引起史学家的兴趣。在欧洲，年轻的汉学家们在关注这一问题时运用了全新的方法：他们寻觅档案，大量研读亲历者的“口述史”，以便做出新的分析、得出新的观点，勾勒出完全不同的叙事。他们的思考不再限于决定“正常科研”和七八十年代著述的冷战思维。[1]2006年他们也许没有明显地关注任何“纪念”活动本身，从

* 本文根据作者2006年4月21日在当代中国研究所所做的一次学术报告修改而成。

长远观点看，著书最终要比为“纪念某某”而在媒体上一次性的抛头露面更重要、更具影响力。近年来美国、日本以及港台的一些著作中对“文革”多有提及，我觉得中国大陆的读者对此了解不多，这是我今天演讲的重点，大家可以把这个演讲视为系列的书评。我不谈个别人的文章，只谈一些比较重要的学术专著。

“文革”中的妇女：话语和记忆

德国汉学与政治学家娜拉·索斯密卡特（Nora Sausmikat）于2000年出版的《“文革”·话语·记忆》一书分析了中国妇女在“文革”中的“生活经历”。[2]不久前，她作为杜伊斯堡大学亚洲研究所的一名教授在柏林创办了所谓“文革圆桌会议”，其研究范围从现代社会文化政治史到亚洲的性别、革命和发展政策。《“文革”·话语·记忆》在德国出版前后，索斯密卡特还用英语发表了同一主题的文章，并汇集成册在英美两国出版。[3]

《“文革”·话语·记忆》第一篇存在一些史实方面的错误，令人遗憾。实际上，作者打算把“老三届”红卫兵的集体命运作为编写“文革”史的中心。在第二篇，作者马上进入了她能够驾驭的所谓智力工作中，得心应手地进行所谓话语分析。这一篇的标题是“国家和一代人的神话”，叙述了1989年春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文革”的日益僵化的单一解释（如关于上层冲突

以及似乎更加“敏感的”政治问题的特定解释）。接下来，她把读者引向了中国人的作品。这些著作相当真实，讲述了“老三届”和“文革”时期所谓“下放知青”的故事，有些是由他们本人写的。索斯密卡特从中抽出一些热点问题，深入而敏锐地探讨其细节。她小心地避开诱惑，不用生硬的不牵扯任何人的抽象概念进行“解释”。1990年面世的《北大荒风云录》被她当作一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事件。这本书盛极一时，竟把现在已被部分神奇化的老三届的经历提升到了受人崇拜的程度。索斯密卡特的研究不仅涉及其中的传奇故事，还包括更广泛的资料。她在第二篇的最后几段引出了该书的核心第三篇，这一部分谈到了妇女的性经历和回忆，以及强奸、英雄主义、变态、力量、革命、自我和女性身体等经常出现的问题。第三篇叙述了三个女人不同的生活经历，作者采取夹叙夹议的方式，先充分阐述，然后再做解释，并把所述事情同该书前面的理论联系起来。在某种层面上，评论和分析只是为了说明，当这些女人在回忆“文革”经历、讲述故事以及接受外国人访问时，优势话语如何以及从什么地方影响了她们。在另一层面，它还通过语境以及有意义的过去，证明每位叙事者都能跟上时代。关于她们的经历，其中一位是钟小姐，出身解放军干部家庭，1968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但很快平反了，现在成为一名商人。她用亲身经历试图证明“文革开始是完全正确的，只是后来陷入了混乱”。另一位是罗小姐，出身普通干部家庭，十几岁时从北京下放到

山西与河北交界的一家工厂工作，在当地结婚，20年后，最终在1991年回到首都北京。她的经历有一段不短的“中断”时间，那时她扎根在中国的一个“落后”地区，现在却隐瞒了这个历史。第三位是郝小姐，其经历确实令人惊奇，在所有故事中最具吸引力。她毕业于北京一所重点中学，年轻的她（至今未婚）似乎“做了一切”，但是到头来发现自己什么也没得到，而她奉行的基本上是一个“误会”。

中国读者也许不会把这本书当作历史“资料”来读。但是，如果他们怀着探索精神深究下去，研究作者的分析，探讨其在政治化的语境中通过个性化的叙事方式所表达的记忆过程、异化、发现和遗忘，那么他们将终有所获，受益匪浅。这本书体现了关于“文革”的一种新学术思潮，越来越受欧洲读者的青睐，它通过性别研究和话语分析，打通了传统汉学通向较新领域的道路。

主叙事与反叙事

过去几年，北美和欧洲不光出版了有关“文革”的专著，还有一些重要的论文集。最出色的无疑当属2006年问世的《中国“文革”史》。不少青年学者，有些来自中国，对该书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们翻阅档案资料，研究诸如“破四旧”运动、江青的“模范”村小靳庄以及“文革”中自成术语的科学等问题。[4]还有一部文集，作为学术著作并不起眼，但是非常值得一读，叫《中国

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叙事和后毛时期的反叙事》。编者庄爱莲（Woei Lien Chong），曾任《中国信息：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现为荷兰莱顿大学讲师，从事当代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该书标榜“脱离把中国‘文革’当作纯政治事件的研究方向”。论文作者来自荷兰、德国、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和美国。他们集中讨论编者在前言中归纳的问题，即“文革”“构建的‘主叙事’”。这种叙事，庄爱莲解释说：“不可能在受到公开挑战时而不危及中共本身的合法性”。书名中的“后毛时期的反叙事”正是作者个人所采取的现实的话语背离行为。当人们细读了400页的关于神话学范式、毛泽东思想多变的特质、宗教式的肖像和仪式、书写惯例、哲学和个人叙事方式等的质疑后，他们就会对反叙事的东西产生一种主观的“感觉”。最后，这个问题变成了研究每个人与1966～1976年中国那些事件发生联系的方式。到头来，经验知识被狭隘地用于处理这本书约一半作者所伸张的性权利。

荷兰历史学家德海尔（Barend J. ter Haar）分析了传统神话学范式对毛泽东时代政治惯例的政治作用，很有意思、发人深省，在热衷“文革”研究的学生们中引起了热烈反响。澳大利亚学者奈特（Nick Knight）对毛泽东著作的分析十分深刻。他令人信服地证明，“文革”宣告了毛泽东空想改革方案的终结。毛泽东在这样一个时刻发动了“文革”，用奈特的话说，当时他“从乐观彻底地转向了悲观。接下去只有斗争。”这个论断看似

不合常理，却有许多可取之处。有趣的是，作者把“文革”作为对所谓修正主义威胁的主动反击并做了广泛的研究。荷兰汉学家兰斯伯格（Stefan R. Landsberger）研究了毛泽东的神化过程，这对德海尔的研究是一个出色的配合。兰斯伯格深入探讨了各种神化方式的细节，如偶像、符号和仪式等。他还研究了毛泽东为摧毁“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旧习惯”而发动“文革”。一旦“文革”结束成为历史，毛泽东便“进入了中国历代神奇领袖的行列”。

德国汉学家威廷霍夫（Natascha Vittinghoff）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叙事和后毛时期的反叙事》[5]一书中分析了描写下放青年的三部舞台剧。她把这些剧作中强烈的反叙事当作一种“样板”。她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和改革初期的中国戏剧舞台强烈地表现了毛泽东主义理想的破灭。基于这个事实，她指出，学术界、社会历史学家或那些从事表演艺术创造与研究的学者，迄今为止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忽略在舞台上塑造红卫兵形象，这是令人奇怪的。威廷霍夫的女同胞佳恩斯包尔（Monika Gaenssbauer）也研究了“文革”结束后关于“十年动乱”的著作，其中较为流行和著名的是冯骥才的著作。她坚持认为这类著作体现了从“伤痕”意识（表示政治与思想的结束）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这些作者表现了对于一种复杂而少见的在那个时代以另类方式出现的对“文革”的赞赏。佳恩斯包尔指出，冯骥才使用报告文学这一形式更接近于代表“迷失”一代说话

的目标。而他和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一度试图通过小说的话语和结构来达到这一目的。正如毛泽东本人说过的，在评价其他人成就时应该有歌颂有批评，但“主要是歌颂”。在这样的谈话中，人们宁可遵循毛泽东的教导，关注香花，而不是流连于杂草和用于陪衬的单一的“绿叶”。毛泽东认为这种陪衬好就好在突出鲜花。

中国档案与“文革”

《中国的记忆管理：国家档案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6]厚达750页，受德国普通奖学金资助出版。该书脚注翔实而深刻，有力地支持了每个论点和论断。作者瓦格纳，现任瑞士加仑大学中国社会文化助理教授，毕业于德国，曾在欧洲文化革命研究方面有所建树。她的硕士论文用德文写成，题目是《红卫兵之歌》。这是一本相当早（1995年）的“多媒体”作品。她对这个主题的研究要比当时已做过此研究的其他学术著作更为深入。[7]2006年，冰岛召开了一个研讨毛泽东生平的学术会议，她又回到了红卫兵这个题目，提交的论文是《性、血、泪：红卫兵抒情诗、视觉艺术和当代拼凑品》。[8]但是她的德文著作《中国的记忆管理》涉及了非常广泛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本书只有一部分，当然是最出色的部分，直接谈到了“文革”。

瓦格纳回顾了中国非凡的档案传统，其特征是国家政治、正史和档案管理紧密相连。在毛泽东时代，更严

格地讲，在“文革”期间，档案部门被当作“阶级斗争的武器”，主要用来支持地方掌权派的政治利益。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档案部门被当作“秘密机构”与公共设施相分离，只服务于国家和中共。尽管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不断开放和现代化，但是档案部门至今仍然被理解为“记忆管理”和合法性创造的关键机构。

瓦格纳研究了“文革”时期的档案。她指出，60年代后半叶的政治领导层（即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开放部分经过精心挑选的档案，他们认为这些档案可以更有效地揭露“阶级敌人”，同时又严格限制人们接触任何看后可能改变对领导集团成员历史与政治忠诚看法的东西。因此，如果有人简单地认为“文革”初期尤其放松了档案控制，那是对那个时期做法的严重误解。实用主义着眼于短期、直接的政治目的（“识别和清除叛徒!”），忽略档案作为馆藏历史资料来保存的长期价值，而这种价值高于所服务的当前斗争。尽管民国时期和共和国早期一度采用了类似欧洲和苏联的档案概念，但是后来放弃了，迅速地退回到前现代时期。从1966年起的10年，与其说中国实现了档案方面的“文革”，不如说以荒诞的方式“回到了未来”。

“文革”结束后，中国的档案管理悄然发生新的可喜转变。瓦格纳专门考察了90年代以来面向公众的越来越多的档案开放对记忆“管理”可能发生怎样的影响：未来还能够维持住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前50年为特征（或做了某些修改）的受控制的历史生产体制（history

production regimen）吗？抑或自由化运动可能引爆隐藏在档案中一直在滴答作响的不计其数的“时间记忆炸弹”？瓦格纳研究问题的视角是两德统一。她提出的许多具有挑衅性的问题，都来自90年代初前民主德国档案向公众开放后发生的现象。

毛泽东与“个人崇拜”

在欧洲新近关于毛泽东时代中国史的分析，最值得关注的一项成果是李塞（Daniel Leese）博士的研究。这位学者在德国慕尼黑大学亚洲系汉学研究所就职。尽管他所在的研究所仍然保留着陈旧的古典汉学传统，如在网站主页上按部就班地刊登的都是诸如古代美术、考古、哲学、民族学等没有时代性的课程，但是李塞的个人研究却是对传统的大胆突破，其标题是《表演的政治与僵化的偶像：中国“文革”时期的毛泽东崇拜》。[9]这部著作基于在中国所做的广泛档案研究。作者充分利用了忻近解密的档案资料，其主要部分来自河北省档案，也包括1966～1970年昙花一现的出版物。它的副标题似乎并不醒目，但是主标题“表演的政治”涉及的绝不仅仅限于“文革”时期。该书前100页详细分析和小心考证了中共对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最初反应。众所周知，后来围绕毛泽东发生的个人崇拜，这只是开始。研究20世纪50年代的学者在李塞的著作中将会发现许多不同于我们已知的中国社会和中共党员

对最初“非斯大林化”反应的观点。如果能在中国档案中发掘出相当于苏联“情绪评估报告”那样的东西（斯大林时代大学生熟悉和充分利用过的一种资源，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大学生只能在偶然的情况下碰到并极少引用），李塞就能构思出某种关于“文革”起源的说法，从而把麦克法夸尔的经典故事推进一步。也就是说，通过指出这个或那个情节不对头，使自己的作品适当地充实起来。读者可以读到当时著名期刊《动态》的一些摘要，如1956年春张家口的一份报告提到“五一”游行时，干部们担心犯个人崇拜的错误，“不敢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

尽管李塞对“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崇拜的叙述有点草率，没有充分展开（不难理解这主要是由于一手资料太少），但他深入探讨了《毛主席语录》的由来。“小红书与红色词汇的兴起”所提供的许多信息，甚至使掌握了丰富资料的研究毛泽东或毛泽东主义的大学生也感到新鲜。它不仅用了一章篇幅叙述了“文革”时期的毛泽东崇拜，而且还利用一手档案资料巧妙地揭穿了多年来被当作“常识”的许多神话，如谁对《毛主席语录》做了什么、原因何在等。许多关于林彪所起作用的被广为接受的说法，经过仔细研究，原来远离事实。“小红书”的初编和印制被李塞问题化了，对它的研究几乎等于“历史的修正”。

《表演的政治与僵化的偶像：中国“文革”时期的毛泽东崇拜》关于“文革”的几个主要章节叙述了《毛

主席语录》的大普及。李塞令人信服地证明什么东西“塑造和维护”了毛泽东崇拜。其答案来自“精英政治、省级中层和基层执行权之间的互动。通过阐明制造和控制崇拜，从浮夸的言论到仪式等几个不同时期……恢复了经常的完全被忽视的史实”。李塞充分利用现代电子资源和研究工具扩大他的档案搜集。来自光盘版《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大量资料被用于支持他关于公众崇拜问题的一些论点。他使用电子搜索引擎发现而非基于人手翻阅文本得来的主观印象，跟踪媒体中的中共一些关键词“提法”的兴衰，如“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等。也许正因为没有受过欧洲汉学传统的训练，李塞才毫不迟疑地从远离统计学和铭文学的领域变通地借用了研究方法。

反思1978年“民主墙”

北欧目前关于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代表作当属芬兰学者帕特马（Lauri Paltemaa，即白劳锐）博士的著作——《历史先锋队内幕：1978～1981年北京民主墙运动和前红卫兵不同政见者的社会动员》[10]。帕特马博士具有政治学和历史学背景，1998～1999年曾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现就任于芬兰图尔库大学极为成功与活跃的东亚研究中心。

帕特马的著作比以上所讨论的其他著作更具理论色彩。它运用“新社会运动”方法解释和分析“文革”结束后和“改革时期”之初这几年发生的所谓北京西单

"民主墙"运动，阐释其怎样把自己塑造成一名社会参与者并证明自己及所提议的改革的合理性。国外较早的研究似乎忽略了"民主墙"的这一方面，或多或少地只关注该运动所争论的民主与人权的形式问题。这种视角最终将轻视运动的历史性质、主张及其参与者的个人活动。帕特马的方法有助于纠正这一倾向，阐明学术界迄今没有回答的一些问题。

《历史先锋队内幕：1978～1981年北京民主墙运动和前红卫兵不同政见者的社会动员》一书的贡献可以归纳为三点：首先，帕特马指出"民主墙"不是简单与走向其政策反面的"文革"相联系，而是以更微妙、更复杂的方式通过从1966年起激进红卫兵发展起来的所谓新"思潮"和"官僚政治理论"与"文革"相联系。这些红卫兵的想法在"文革"后期和1977～1979这几年经历了显著的转变，但根除官僚阶级的结构性原因仍然为"民主墙"运动保留了民主改革的基本原理，并为这一运动的社会分析提供了基础。

其次，帕特马指出了积极分子在多大程度上把民主改革的争论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以及克服政治上层建筑的阻碍实现社会主义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方式。民主制度被视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而"民主墙"刊登的许多理论文章都应理解成为达到这一目的而进行的争论。西方（尤其美国）学术界和大众传媒早先都把这一运动描述成试图在中国实现非社会主义的民主、"人权"、个人自由等观念的运动，而帕特马则认为运动

中相当多的积极分子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和他们所主张的巴黎公社型的民主制度。自由、民主和人权具有普遍的吸引力，但是常常被变通地用于为社会主义民主提供结构模式。而且，积极分子发现他们在辩论中捍卫的这些制度是历史进化的遗产，它们来自较早的发展阶段。这其实就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只有少数积极分子采用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捍卫民主制度。

最后，帕特马阐明了"民主墙"运动怎样试图把自己描绘成代表人民利益的具有历史进步性和必然性的运动，积极分子们怎样扮演具有毅力、勇气和政治觉悟的"觉醒的一代"，怎样作为先锋队领导人民反对官僚的"封建法西斯专政"。他指出，中共体制没有受到来自运动的攻击，攻击者只是参与者中的一小部分。积极分子为了阐明和捍卫他们的信条，创造了一种关于"文革"的叙事，说他们通过"文革"已在政治上成熟起来了，已学会用毛泽东学说识别"左"派利用党来欺骗群众，以掩盖他们赤裸裸的权力欲和特权欲。1979年以后，"民主墙"运动逐渐被神圣化为承担革命先锋重任的具有政治自觉性的青年运动。

《历史先锋队内幕》一书揭示了"文革"与后毛泽东时期的中国社会冲突。作者证明，至少就"民主墙"而言，它与"文革"之间的连续性要比以前研究者的看法更大，而与后来的"民运"之间没有连续性。作者还证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民主思想和共产党人对冲突的看法，通过其参与者对把"民主墙"建设成为合法的社会

行动者施加了相当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要比自由主义者的民主人权观念大得多，尽管后者也发挥着一定作用。

结　束　语

今天提到的有些作者可能惊奇地发现，他们以这种方式汇集到欧洲“文革”研究这个统一的标题之下。但是，有一点必须指出，即各种观点都在力争引人注目：国际社会中，即便在使用中文（在中国国内和国外）发表文章的“文革”史学家之中，也没有任何人接受主叙事。实际上，我们不是按照一种“大方向”来写作。我们力图写出我们自己的故事，做出自己的分析，阐明我们认为重要的事情，舍弃我们认为荒谬的事情。我们坚持我们偶然得出的最好结论，而不是以积极肯定的态度对“大动乱年代”争取一个特定的一致看法。在一些场合，我们可能不幸地得到错误的信息，但在其他场合却有望并非如此：我们已经认识到的并且视为我们著作出发点的事物尤其重要，必须定位在直接的“事实记录”。这个问题的最后一点，包括关于已发生事物的理论化及其“思索”的抽象领域，我们在中国同行那里受益良多，其中也有今天所讲的内容。谢谢！（罗燕明译）

---

[1] 这里，“正常科研”一词借用昆恩（Thomas S. Kuhn）的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在该书第24页上，它指“用既定范例来研究现象和理论的……一种方式”。

[2] Nora Sausmikat, *Kulturrevolution, Diskurs und Erinnerung: Eine Analyse lebensgschichtlicher Erz? hlungen von chinesischen Frauen*, Frankfurt a. M.: Peter Lang, 2000.

[3] Nora Sausmikat, “Female autobiographies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returned *xiaxiang* educated women in the 1990s”（《来自“文革”的女人自传：90年代回城的下乡女知青》）, in Frank Pieke and Hein Mallee, eds.,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Chinese Perspectives*（《国内与国际移民：中国视角》）, Richmond, Surrey: Curzon Press, 1998, pp. 297 ~ 314; Nora Sausmikat, “Resisting Current Stereotypes: Collective Stigmata and Patterns of Individual Positioning in Autobiographical Accounts of former Rusticated Women”（《反抗现代陈规旧习：前下乡女知青自传作品中的集体标识与个人定位方式》）, in Woei Lien Chong and Lowell Dittmer, eds., *China's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Master Narratives and Post - Mao Counternarratives*（《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叙事和后毛时期的反叙事》）,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2002, pp. 255 ~ 283.

[4] Joseph W. Esherick, Paul G. Pickowicz, and Andrew G. Walder, eds.,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5]《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叙事和后毛时期的反叙事》附有一份出色的书目、一个中文术语表和一份综合索引。

[6] Vivian Wagner, *Erinnerungsverwaltung in China: Staatsarchive und Politik in der Volksrepublik*, Køln: Bøhlau Verlag, 2006.

[7] 英文文本修订版网址：http://www.indiana.edu/%7Eease/resources/working_paper/noframe_10b_song.htm.

[8] 论文摘要网址：http://www.kim.is/Mao/Wagner%20Abstract.pdf.

[9] Daniel Leese, *Performative Politics and Petrified Image: The Mao Cult*

during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Breme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06. A revised and corrected text is slated to be posted on the World Wide Web sometime in 2007.

[10] Lauri Paltemaa: *In the Vanguard of History——The Beijing Democracy Wall Movement* 1978 ~ 1981 *and Social Mobilisation of Former Red Guard Dissent*, Turun Yliopiston, Turku, 2005.

执行编辑：叶张瑜

国史研究参阅资料

2007 年第 10 期（总第 356 期）

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社编

地址：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邮编：100009

电话：66572319　66572304

传真：66572310

E - mail: ddzgs@ iccs. cn

准印证号：京内资准字 9807 - L0088